我们的组织任务

杜临

《呼声》编辑部

Istrutevi perché avremo bisogno di tutta la vostra intelligenza.

Agitatevi perché avremo bisgno di tutta il vostro entusiasmo.

Organizzatevi perché avremo bisogno di tutta la vostra forza.

学习、激奋、组织——智识、热情、力量。

我们的组织任务

一、老调重弹的必要性……1

二、民主集中制和“思想团结”……7

三、左翼大团结如何同宗派主义结盟，
以及马克思主义的路线问题……14

四、在组织之前，或组织作为政治延伸……21

附录

论实践问题……25
弗兰尼茨基

论策略……33
普列汉诺夫

我们的组织任务

一、老调重弹的必要性

中国马克思主义在 2019-2920 年疫情初生时经历了一轮大洗牌，那些以往怀着热切希望的革命者随着“左圈消消乐”的失败遁入虚无，另一群对马克思主义感兴趣的青少年涌入进来，各自加入了苏联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阵营中；无聊的日子过去后，到了 2022 年末，当局在防疫政策上突然转入“休克疗法”的动荡造成了新一轮马克思主义者的膨胀，这次的形式要不同些：大大小小的“马列墙”和一些马克思主义团体相继建立起来。虽然这样一些团体和通讯员具有许多缺点，但他们的数量和范围已然是中国资本主义出现裂痕的明证。想要给这些薄弱裂痕开一个更大的口子，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就要抛弃在上个十年间不断循环被发明出来的组织-理论图型，然后根据对当前历史阶段的判断提出自己的任务和前景。

毫无疑问，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目前的紧迫任务是建立自己的政治组织。任何智力健全的马克思主义者都不会不同意这一点，只需要想想白纸运动期间马克思主义者无法作为集体进行介入的无力就够了。事实上，从 2018 年鼓吹建立“全华政治报”的莱茵学社[1]到最近宣称要进行武装割据的内蒙古左翼联合会，形形色色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提出了建立、扩大政治组织的任务，但却无一例外都失败或即将失败了。对他们的失败造成影响的因素花样繁多。例如，莱茵学社在其社长米宁的盲动主义路线带领下过早地以全体组织名义公开声援工人运动和提出政治纲领，结果遭到了当局的毁灭性打击；然而，

[1] 许多 2020 年之后进入马克思主义圈子的人大概不会听说过莱茵学社，它在当时是相当大的一个左翼组织，拥有一个刊发过数种刊物和一个文库的地下出版社。

米宁系高级官僚家庭出身，在供出成员名单后自身毫发无损，甚至还获得了保研资格；在学社解散后，其他成员却长期遭到监视。让这个米宁从“革命领袖”变成叛徒的原因有许多：卑鄙怯懦的性格；把担任组织领袖当作耍官威和乱性的保障（在莱茵学社前成员那里，他的丑闻可不止一星半点）；把马克思主义事业视为一种长期的政治投资，把建立学社和被某些高级领导人接见的经历变成政治资本大加吹嘘，等等。举出米宁的例子不是为了让老一代马克思主义者回忆青春，而是要他作为一类人及其组织的代表，以供当前运动中的马克思主义者参考。抽象掉使米宁成为米宁个人的特殊条件，甚至抽象掉他对自己同志犯下的累累罪行，他只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一种典型：先是由于各种原因接触马克思主义，后来接触到了庞大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圈子，在混迹圈子的过程和别人形成社交小团体，由于自身的一些独特优势（通常是所谓的“人格魅力”加上一些专长）迅速成为小团体的灵魂人物，之后便并逐渐开始向正式组织发展。把前面这些流程的顺序调换一下也无所谓，读者自然知道，在这里最重要的是提取出这类“革命领袖”成长的一般要素。

一切看起来都顺风顺水，成为先锋队的领袖似乎已经指日可待了。然而，在这时往往出现许多猝不及防的情况，使得“革命领袖”的计划功亏一篑。这个意外可以是某个成员被当局查获，可以是组织本身的盲动主义导致的，也有可能是内部思想混乱或权力分配不均所导致的。特别值得说道的就是这些组织内部的权力斗争了。常有人讥讽“这些学生们随便建立起来的网络组织有什么切实的权力？”但事实上，这些团体的权力关系正是它们失败的原因。在既定的知识和意识形态背景下——在这里就是马克思主义——只要拥有超过身边那些同好的知识或组织能力（甚至有时都不需要，只要自己拥有一些其他人所没有的东西就足够了），并且获得他人的承认，便可以在小团体的交往中获得超然地位，于是在特定范围内便拥有了一定的权力。并不是任何权力都需要暴力为之作保，在这里，**权力来自他人的承认，他人因这种权**

力而承认。这就是为什么**即使不存在真正的强制力，这些团体也往往具有一套不成文的社交规范或纪律约束**。这并不是说小团体的意见领袖必然有什么异于常人之处，他甚至可以完全没有真才实学：只需要凭着一个某某大学硕士在读的名号，或者在什么斗争里英勇地遭到当局“抓捕”，这就足以收获其他人的尊敬和爱戴了。真实的能力在这里并不重要，唯一重要的是利用自己**在资本主义社会和马克思主义“亚文化”中的身份优势**，俘获那些将要承认自己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些团体的交往方式从来不是建立在革命的目的上，而是植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人缘交往，这就是为什么那些被广泛承认的团体——无论是学术沙龙还是“革命组织”——都存在着巨大缺陷，从根本上断绝了成为革命政治推行者的可能。

一部分托洛茨基主义者将这样的意见领袖称为左派阵营里的“皮包经理”——以革命之名，行投机之实。投机可以是为了攫取马克思主义的亚文化经济利益，例如近两年喜闻乐见的苏打水或即将问世的苏俄桌游[1]等等，也可以像米宁那样是为了捞一笔政治资本，或者更简单些，只是为了享受在既有秩序中掌握的支配感而已。无论这些“革命领袖”和“学术大佬”知识多么丰厚，公众姿态多么激进，他们的学术知识和激进话语-行动对革命活动来说都只是一堆被雕琢成饰品模样的有害垃圾。他们不仅毫无益处，而且总是把那些原本有可能走向革命道路的人重新带到粉刷成赤红色的资本主义迷宫中。

左翼的“皮包经理”如此，那些批判他们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又如何呢？自 2019 年托派两大团体停止运行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退回编辑、翻译文献的领域中去了。新世纪的老一代托洛茨基主义者在这个领域进行的辛勤劳动使我们得以阅读大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文献，这是任何人都不可能抹去的贡献。但让人不能理解的是，这些努力翻译阶级斗争文献的托派前辈们却

[1] 这位桌游制作者和苏打水之主还是相当不同的，毕竟他从未像后者一样标榜自己是革命者，也没有对马克思主义内部阵营产生什么大规模的倾向影响。我们应该对他这样的同路人更宽容些，对那些自称革命者的苏打水迷更严格些。

对马克思主义者的组织活动抱有相当的悲观态度。虽然绝对多数团体组织都符合他们对“皮包经理”的批判，但这种把孩子和洗澡水一起泼掉，因错误的组织否定所以组织活动的意义的行为，我们是向来不能接受的。这也许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但也潜藏着更深刻的理论原因。在《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任务》的一处翻译处理上，一位值得尊敬的老托派是这样说的：“后一小句：‘也把关于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全国民主运动—— 特别是我国无产阶级——的政治任务的思想带给他们’，是李星同志建议的译文。官方（即人民出版社）的译文是：‘也对他们灌输关于阶级斗争、社会主义、整个俄国民主运动特别是俄国无产阶级的政治任务的思想’。李星同志的意见如下：‘灌输关于阶级斗争’一句的原文是 заносили и в них идеи классовой борьбы，直译：把关于阶级斗争的思想（理想）带到（送到）他们中……。（官方的）那种无时无刻不想着“我灌输你”的翻译指导原则，不可能不歪曲一些基本的马列思想。”把阶级斗争思想带给群众和灌输给群众究竟有什么区别呢？无非只是觉得前者更好听，更符合让无产阶级自发地成长的想法罢了。老托派在反斯大林主义的路上越走越远，甚至要把在他们看来可能导向官僚党的列宁主义灌输论也一同避免掉！到了今天，他们的哲学盟友把拉尔斯·利赫的《列宁再发现》视为珍品，要给《怎么办？》和列宁的一生安上考茨基忠诚学徒的名头，然后把十月革命和布尔什维克的成功说成是实现了什么“多元专制权力”。这个高深莫测的词究竟是指什么呢？他们自己是无法用通俗语言讲出来的——因为这样就会导致他们的无知完全暴露出来！多年来进行的（我敢说是完全值得尊敬的）同斯大林主义的斗争后，他们的思想却走到了反列宁主义的结局，这不得不成为托洛茨基主义者的悲剧。

无论如何，老托派（他们的哲学盟友不在此列）至少让我们学习到很多东西，但另一些托派（实际上并不是独属于这部分托派的想法，而是**普遍存在的**）则完全走到反动的一边了：他们看不起任何组织活动，甚至一丁点开展组织工作的意图都要被他们抹杀掉，要被嘲笑为幼稚的“角色扮演”把戏。

而他们自己却在……编译各种稀奇古怪的“文献”！还有……热衷于给各路人马设计游戏模组，空想一个崩坏的或美好的新奇世界，或者在自己的社交俱乐部里大谈特谈革命共和国的行政区划与具体制度……这不是因为他们的能力不足以驱使他们做些认真的工作——旁征博引时的他们看起来仿佛是某个高校的历史硕士——他们只是从来没有把马克思主义的组织和革命活动当成自己的任务，而是想着在枪打出头鸟后自己就可以空降成革命的领袖了。我向来不爱用“小资产阶级”这个词给别人下价值判断，但如果这不是小资产阶级，哪里还有比这个词更合适的用语呢？这些对革命原则和行动漠不关心，仅仅想着满足自己权力欲望的马克思主义者不是革命最险恶卑鄙的机会主义敌人又是什么呢？

托洛茨基主义曾在前两个十年中起到极富变革性的作用。正是在他们同斯大林派或毛派的论战中，左翼思想逐步走进了更广阔的历史，而不仅仅是止步于所谓的“发掘历史真相”。我们不应该忘记，十多年前许许多多怀抱着左翼理想的人甚至会将朝鲜或重庆模式视为启明星，觉得只要把国家制度变回“前 30 年”那样，就可以重新回到“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时代了。另一方面，老一代托洛茨基主义者还翻译、整理了大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文献，我们可以随便列举几本：《1917-1923 德国革命》《德国革命中的工人政治》《西班牙革命与内战》《不向风暴低头——战时日本印刷出版工人的抵抗》《卡车司机的造反》。[1]谁说这些翻译著作对马克思主义者没有贡献，谁就是因可怜的派别成见而无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际发展。除了这些纸面上的贡献之外，他们最晚在 10 年代初就组织了第一批左翼融工实践。但是由于当局的直接打击和老托派从实践中提炼出的理论对列宁主义（甚至对托洛茨基主义本身）的偏离，他们不仅没有形成某种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雏形，反而是

[1] 除了直接叙述和分析历史的材料之外，还有很多著名人物的著作都是被他们翻译的，我们只需要举出一例就够了：小李卜克内西的《主要敌人在国内！》。

走向了**直接的工人主义**。例如，他们认为只有同工人运动直接相关的文献才是“有价值的”，并且还试图去除列宁的灌输论和布尔什维克组织制度。自 2019-2020 年形成的新一代托洛茨基主义者不是赞同老托派的意见，就是同老托派根本断开了联系，同主流马克思主义者（也就是说，和他们鄙夷的斯派或毛派）一样，掉进了把马克思主义当成精神慰藉的知识陷阱，并且比他们的对手走得更远。因为主流马克思主义者的组织尝试几乎无一例外都沦为资产阶级社会关系的俘虏，而它又长期把托洛茨基主义视为自己的阶级敌人，所以在反击的过程中，托洛茨基主义者几乎彻底地、自觉地进行了去政治化的建设，而这就意味着不进行任何组织。

除了故意或半故意地引导他人走向资本主义道路的意见领袖和机会主义者，以及害怕进行组织的托洛茨基主义者之外，还有更多刚刚步入马克思主义大门的赤子：他们真心向往社会主义的明天，但却不懂得该怎样进行革命活动，甚至连革命活动的准备工作都很难完成；他们自己不晓得自己的缺陷，相反还经常以已有的“实践”为傲，拒不接受批评。其实他们的所作所为根本算不得革命的实践，往往只有在自己团体遭受重大打击后，才亡羊补牢地反省自己的错误。[1]更重大的问题在于**马克思主义者内部圈层化的加深**。更加老练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不是无法同新生的马克思主义者取得直接联系，就是由于缺乏组织，根本没有成建制接触的可能。时间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内部具有不同的形式：自 2019 年以来，不是十几年产生一代马克思主义者，而是几乎一年就可以产生好几代互相隔绝的信仰者；每一代马克思主义者都只能根据既存社会结构和自己能接触到的文化圈子和知识结构，从头开始发展自己的见解。**自 2019 年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不是逐代提升，而是**

[1] 最近绍兴一些马克思主义学生团体的经历充分展示了这些特征。他们起先对《呼声》编辑部的批评采取“费边战略”，也就是在口头上让步，但实际上仍然认为自己“丰富的实践经验”足以支撑自己的工作，即使他们并不能在同《呼声》编辑部的辩论中占得优势。双方就这样拉锯了将近三个星期，只是到了团体因被校方查获而被迫解散时，他们中的一些人才想起了《呼声》事先的批评，不再把原先宝贵的实践经验奉为圭臬。

在它的每一代信仰者那里陷入重建和发展的循环。[1]这在卷帙浩繁的左翼刊物中尤其尖锐地表现出来：每几个月就有一大批时兴的左翼刊物涌现出来，但大多数只出到一两期就再也没了消息，那些稍久一些的如果不是遇到内部分裂，就是因为策略问题招致当局的打击，最后被迫解散了。然后再过几个月，又有一批新的刊物和团队冒出芽来，把之前的发展轨迹重新走上一遍。

马克思主义政治组织的作用之一正是累积理论和政治经历，使革命意识跳出可悲的时间循环。要么不愿成为革命者的预备队，要么没有能力有效地从事这种工作，这就是以往的团体和目前的团体失败和必将失败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呼声》编辑部要再一次操弄起老调子，重新提出组织任务的紧迫性。

二、民主集中制和“思想团结”

在马克思主义团体的组织建设中，没有什么词出现得比“民主集中制”和“思想团结”更频繁了，它们仿佛有什么魔力似的，似乎只要在纲领中写下这几个字，组织生活就永远不会出现什么问题，正确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路线就会像圣奥古斯丁的光照一样普射进来，逐级流溢进每一个虔信成员的心灵。目前的马克思主义团体是怎样理解民主集中制的呢？让我们来看几个例子吧。

在一份《会议记录》中，内蒙古左翼社团联合会这样的组织仅仅是说：“内左联内部社团有义务维持自身和内左联的稳定，少数服从多数，建立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在这里是什么意思？它只是指少数服从多数吗？这样的话，资产阶级议会在形式上是不是早就取得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呢？如

[1] 当然，每一代马克思主义者根据自己所处的不同背景，都具有不同的“风格”。例如，为数不少的人都认为自己对后 68 时代法国哲学家的研究是将马克思主义上升到了新的高度。这些人几乎无一例外都走到保卫资产阶级日常生活的立场上，这并不是偶然的。这种维护资产阶级学术生产和再生产的行为在任何意义上都没有发展马克思主义。

果“少数服从多数”和“建立民主集中制”是并列关系，那么民主集中制的确切含义是什么呢？内左联是一概没有说明的，就像他们从来不在自己的宣言中说明自己的路线一样。

像莱茵学社这样的组织是怎么说的呢？米宁在他最自鸣得意的大作《局势与任务》中没有直截了当地说民主集中制如何如何，而是提出“革命团体要想发展……必须满足……组织性、民主性与保密性。”根据上下文和马克思主义圈子内的“常识”，这组织性和民主性的总和大概可以看作民主集中制，因为后文说保密性只是“就目前而言”十分重要的，因此并非民主集中制的一般要素。米宁说，组织性就是把每个成员编入组织体系分工工作，而民主性就是“调动起它的成员参与整个团体决定的起草和制定工作，参与到对重大原则的讨论之中。”不难看出，米宁对组织性的强调完全是照搬了列宁对党员资格和“小螺丝钉”的坚持，而在民主性那一方面，他和口齿不清的内左联一样，先把民主集中制视为某种确切的制度，然后试图用一堆空话糊弄过去。

目前下辖杂志《热浪》的“革命共产主义同盟”更奇怪些。他们居然在自己的“党纲”中声称：“为了捍卫革命的纯洁性坚持党内民主，而党内民主的前提就是派别的多元化……只有各种声音都存在的组织才有能力领导革命。”他们甚至不愿意多掩饰一下自己的反马克思主义倾向，还沾沾自喜地认为自己找到了保持革命“纯洁性”的良药。列宁早就说过，党内存在派别正说明了党的集体陷入非健康的状态——因为**一个**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只能拥有**一个**革命的纲领——而在这时就应该采取措施使派别活动消亡。当然，这不意味着要直接用行政组织手段开除反对派，在面对施略普尼科夫和科伦泰的工人反对派的时候，列宁不正是同他们正面交锋辩论的吗？在那一次代表大会上，施略普尼科夫甚至仍然被选举为党的中央委员，并没有因参加派别活动就惨遭清洗。**党内派别的存在是客观的，就像导致它的社会斗争形势一样**，它的存在意味着党在某个地方由于思想不同存在两个纲领，因而对于

一个应该具有统一思想和路线的革命党是不健康的。正因派别活动的根本在于社会斗争形势，简单地用组织手段开除反对派没有任何助益，反而只是消耗党的精气。“革命共产主义同盟”看到了斯大林动用行政手段摧毁党内反对派的情况对联共造成的巨大破坏，希望**从制度上**杜绝这一问题发生，但却结果径直走向了斯大林的反面，不加思辨地鼓吹多元派别民主，这和那些宣扬多元激进民主的“后马克思主义者”有什么实质上的区别呢？只不过前者说的是所谓“革命者”的多元，而后者说的是市民社会中反抗力量的多元罢了。对革命者思想多元化的痴迷不是偶然的错误。一方面，革命共产主义同盟完全不理解列宁主义的组织方法，另一方面，他们组织的思想基础不可能不促使他们拥抱左翼大联合的图景——在纲领中，他们说自己的基础主要是托洛茨基主义和毛主义的联合。

革命共产主义同盟的错误不仅在于做着左翼大团结的美梦，在他们的刊物《热浪》的第八期里，一篇叫《民主和集中矛盾的概念》完全展示出作者以及**允许其刊登在刊物上**的编辑部人员对民主集中制的无知。作者先是把集中和民主两个词分开，然后痛陈“历史证明只有集中的后果是官僚特权团体的形成以及资本主义复辟”，接着就去赞美民主。我们首先要问，在民主集中制，民主和集中竟然是两个可以先被分离，然后被简单地相加起来的概念吗？更严重的是，整篇文章一直在两个主词之间跳舞——一会儿是党的民主集中制，一会儿又扯到国家的民主集中制。文章的作者还号召“实现真正的民主集中制，要让权力回到无产阶级手中，就要摧毁官僚的国家机器。”我们不禁再次发问，在列宁乃至全体马克思主义者那里都只用于党的民主集中制，为何在《热浪》的这篇文章中突然成了国家的制度，把公社原则都给取缔掉了？我们要劝告《热浪》和所谓的“革命共产主义同盟”，自己一知半解却妄图解答共产主义运动的斯芬克斯谜题，这样的人和那些热衷于显摆自己学识的文艺青年完全是一回事。

无论是内左联、莱茵学社、“革命共产主义同盟”还是其他组织，它们

都仅仅把民主集中制理解为某种一待建立就无比牢固的制度，它在形式上和资产阶级议会并没有什么区别。“可如果这样，你们怎么解释考茨基、伯恩斯坦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同列宁的俄国社会民主党（布）的区别呢？或者，你们怎么解释 20 年代初期的国民党同共产党天壤之别的行动力？”这就是我们要问的问题。作为德国党党建的坚决学习者，列宁是如何使自己和布尔什维克在第二国际中独树一帜，甚至让卢森堡都难在组织领域望其项背的呢？仅仅把民主集中制视为一种组织制度的人不可能完整解答这个问题。一些聪敏机警的人会说，这是因为布尔什维克具有革命思想，而德国社会民主党没有。可是，为什么布尔什维克可以保持革命思想，而更为强大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却不能呢？民主集中制的优越性到底体现在哪里呢？上面这些问题可以归纳为一个根本问题：**作为一种正式制度形式**的民主集中制可以稳当地确保革命思想是被服从的多数吗？答案毫无疑问是否定的：**科学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真理并不是一人一票投来的，而是从艰苦的理论劳动提取出来，经过无数的政治斗争才有可能占上风。它并不能保证自己从一开始就是大多数。**有一个历史事实是值得注意的，虽然布尔什维克名为布尔什维克（俄语意为“多数派”），但实际上列宁的派别只是在一次会议上取得了微弱多数，而后长期却居于少数地位。也就是说，在 1903 年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列宁的布尔什维克长期是占据少数的，在那时，布尔什维克原本该被称之为“孟什维克”（俄语的“少数派”）才对。无独有偶，在 1917 年爆发革命后，当列宁在 4 月回国时，迎接他的革命思想的并不是布尔什维克同志们的鲜花与掌声，而是被当作巴枯宁主义新“王位的候选人”。革命中的列宁在自己的党内再一次在最初处于少数派位置，而这时距离布尔什维克独立建党和同孟什维克完全分裂已经过去五个年头了。此后在工会作用的辩论、粮食税和新经济政策的抉择、斯大林和格鲁吉亚问题等时刻，列宁无不是处于这样从少到多的转变中。看来，手握真理并没有让我们的伊里奇从一开始就在民主集中制中占得优势，只是通过不断的斗争，科学的、革命的意见才成为全党的意见，弗拉

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才成为列宁。问题在于，列宁是靠什么在一次次斗争中总是取得胜利的？或者说，革命者凭什么能够在斗争中不落下风，最终夺得胜利？在加米涅夫、斯大林、波格丹诺夫等布尔什维克等中央委员会成员集体反对自己时，列宁仍然不停地在《真理报》上战斗着，并且到群众中进行一些宣讲（这一点的影响要少一些，因为最初列宁被诬蔑为从德国来的奸细，因此群众具有较大的敌意）。通过《真理报》在布尔什维克中的广泛传播，列宁绕过党中央，迅速同区级和基层党组织等中下层党员取得实质上的联系，在短短的一个月内就取得了多数党员的支持。那时的布尔什维克是怎么看列宁的呢？柳德米拉·斯塔尔说：“看到人民的独立创造，我们却不能对他们进行指导……我们的同志只能局限于通过议会方式为立宪会议做准备，根本没有考虑到继续前进的可能性。采用列宁的口号以后，我们做了生活本身向我们提醒的事情。”[1]在这场两大派别（一边是老布尔什维克，另一边是列宁以及其他边缘人物，如孟什维克中的科伦泰以及远在莫斯科的布哈林）的对决中，列宁正是因为同“生活本身”深刻地联系在一起，同党的基层党员形成了一种有机联系，这才能够快速地取得对持保守态度的党务体系的胜利。只是在这时，党才同“生活本身”恢复联系。党的领袖同党的基本成员之间的**有机关系**，这才是民主集中制最伟大的内涵。我曾同《呼声》编辑部的一位新同志提起，讨论民主-威权同集权-分权的关系充其量只具有次要意义。再分权的架构也无法永远让真理处于多数，最民主的制度也不能保障领袖的政策一直符合自己所代表的集团。最重要的永远都是领导与成员的有机关系。如果说无产阶级先锋队必须同无产阶级结成有机关系，那么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领导层也必须同基层成员形成这样的关系。正如有机这个词语所表示的，这种团体内的领导和成员的关系并不是机械的、可以分割的：“这可以说是一种运动中的‘集中制’——也就是说，它使组织不断适应实

[1] 引自托洛茨基的《俄国革命史》。

在的运动，使上面的指令符合下面的进展，不断吸收普通群众中涌现出来的骨干分子充实领导机构的框架，确保其稳定性和连续性，长期积累经验。”[1]也就是说，领导不是也不能是被强加上来的，成员对领导的追随来自双方的交互和真正代表关系，用列宁的话来说就是“革命者之间的充分的同志信任”。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以为无法实行真正‘民主的’监督，就会使革命组织的成员成为不受监督的人，那就大错特错了。他们没有时间去考虑民主制（一些完全相互信任的同志们所构成的狭小的核心内部的民主制）的儿戏形式，但他们非常真切地感觉到自己的责任，并且他们从经验中知道，真正的革命家组织是会用一切办法来清除其中的不良分子的。而且我们还拥有在俄国（以及国际）舆论对于一切偏离同志关系（要知道，‘民主制’，真正的、不是儿戏式的民主制，正是同志关系这个总的概念的一部分!）的义务的行为，都要予以严厉的谴责。”[2]

民主集中制的意义就在于同志间的有机关系，失去了它之后的布尔什维克组织到后来只不过是官僚集中制用旧日荣光所打造的一副皮囊而已。真正的先锋队所倚重的不是一套尽善尽美的组织制度，而是坚决的革命原则加上赤诚的同志关系。

这种有机关系乍一看不像是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反而像是某些隐居叙利亚的修士对上帝的静观体验的马克思主义版本。自然，把握关系本来就要比把握实体——特别是固定的制度——更“玄学”一些，更何况这还是革命者之间的有机关系。如果把它同另一个常被写进纲领里的词放在一起理解，疑惑就迎刃而解了——“思想团结”。**党的领袖同党的成员之间的有机关系就是思想团结的具体形式**，它并不简单地等同于一致同意要推翻当局和建设共产主义，而是要在具体的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上取得一致，从而也就是在运

[1] 《狱中札记》。
[2] 《怎么办？》。

动的方式、变革的目标以及各阶段任务及其具体操作上达成一致。

以上这些恰恰是以往的和目前的马克思主义团体所欠缺的。一些团体和组织认识到了缺乏有机关系和一致意见的重要性，试图通过几份纸面纲领来规定自身。然而，这些纲领只是发出关于组织制度的长篇大论，不是完全没有研究过现实问题，就是用一句话草草地把共识一笔带过。再完美的制度也无法弥补有机关系的缺乏，这就是为什么在苏联帮助下改组的国民党仍然缺乏同时期中国共产党那样的动员力量。早在 1902 年，列宁就表达过对建立尽善尽美的制度章程的厌恶：

章程所以没有用处，不仅因为革命工作并非总是要采取固定的形式。不，固定的形式是需要的，我们应当尽可能使一切工作都具有固定的形式。固定的形式的适用范围大大超过人们一般的想象，**但这不是通过章程可以达到的**，而只有靠（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地说过）向党中央确切报告，只有那样才会有同真正的责任制和（党内）报告制相联系的真正的固定的形式。我们解决严重的冲突和意见分歧，实际上根本不是“按照章程”投票，而是用斗争和“退出”相威胁，这我们谁不知道呢？我们大多数委员会近三四年的党内生活，就充满了这样的内部斗争。很遗憾，这种斗争并没有用一定的形式规定下来，不然的话，它给党的教益就会大得多，给我们的继承人留下的经验也会多得多。但是，这种有益的必要的形式的产生，并不是靠什么章程，而仅仅是靠建立党内报告制。在专制制度下，除了定期向党中央汇报外，我们不可能有党内报告制的其他手段和武器。

只有广泛地学会运用这种报告制，我们才能真正取得让各种组织发挥作用的经验，只有以这种广泛的多年的经验作基础，才能制定出不是纸上的章程。[1]

取得同志间的有机关系必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在推进的过程中难免

[1] 《就我们的组织任务给一位同志的信》。

遭遇分歧甚至分裂。原本以散漫社交关系为存在形式的团体有可能在建立有机关系的过程中完全撕裂开来，这就是为什么以往的和目前的马克思主义团体都无法或不敢提出严肃地建立组织的任务。目前马克思主义阵营里的一些丑闻和整体思想相对于群众运动的落后也导致了对于成立严肃组织和进行分裂和斗争的神话：一旦有人因建立组织而发起同组织内外错误倾向的斗争（例如最近《呼声》对合法主义的斗争），一些所谓的“马克思主义者”就开始扮演宋襄公的角色，打出一面名为“左翼团结”和“分裂有罪”的仁义大旗，声称任何分裂都是对马克思主义阵营的打击，或者干脆是攻击其为左翼政治的角色扮演行为。不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判断，而是根据既有的经验和任凭意识形态遮蔽得出结论，这在目前已经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判断左翼团体的通识了。如果说由于认识不清导致的指责是情有可原的，那么被斗争的一方惯于用左翼大团结的口号博取同情和掩盖根本性的路线错误，这种利用错误认识为自己攫取政治支持的行为就完全和资产阶级政客一样了。不建立同志间的有机关系的组织最终只能走向和资产阶级秩序同谋的结局，无论他们自己口头上是如何声辩自己的激进或未来打算的。

三、左翼大团结如何同宗派主义结盟，或论路线问题

反对左翼大团结并不意味着《呼声》坚持某种形式的宗派主义，《呼声》恰恰是这种有害思想的坚决反对者。然而，目前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运动中，宗派主义却以一种流行的方式裹挟了许多怀有严肃期望的马克思主义个人和组织，而且更让人惊愕的莫过于左翼大团结的鼓吹者常常也是最坚决的宗派主义者。我们仍然记得莱茵学社是如何一边要求放弃争论一国建成论，一边同马列之声一起清算所谓的“左圈”的：在莱茵学社最后一份刊物的创刊号上，他们放任马列之声的成员毫无根据地把“左圈”同托洛茨基主义绑定在一起，宣布马列主义者的任务就是消灭“左圈”；而与此同时，莱茵学社的

社长却在自己的大作中规劝马克思主义者在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问题上不要争吵，要把一切问题拖到革命胜利后再解决。

这种表面上宣称左翼大团结，实际上却大肆攻击自己要团结的“同志”的行为早成为屡见不鲜的事情了。最近的马克思主义圈子里时兴的自由主义代表杂志《调查》不正是以这种方式对待《呼声》的吗？无独有偶，《调查》的领导人物也支持将毛思想同托洛茨基主义嫁接在一起，《呼声》第五期已经对此开展了很充分的批判。更重要的是，除了这些明目张胆地要求各大派别进行调和的团体之外，即使是那些声称自己是坚决的马列毛主义者，并且坚决地反对“安托西修”的人也完全同时陷入了宗派主义和左翼大团结之中。这不是在玩弄词汇，而是在陈述一个客观事实：左翼大团结同宗派主义并不互相排斥，相反，它们在一定的条件下是成对出现的。怀疑这一点的人只需要看看马列毛主义者的现状就够了。我们记得，至迟在 2020 年的时候就有人提出马列毛主义者要维护自己的革命纯洁性，就必须同“安托西修”进行不可调和的坚决斗争。到现在这一斗争已经进行了三年。它的影响是很广泛的，以至于绝大多数马列毛主义者（虽然他们连《国家与革命》或《哥达纲领批判》这样的关键著作都误读了或干脆没有读过）都知道“安托西修”作为整体意识形态立场的存在，并且常常以幼稚而不失勇敢的姿态去反对这些“小资产阶级思想”。可是，马列毛主义者的团结情况怎么样了呢？且不论马列毛主义者在面对希腊共产党、印共毛、秘鲁共产党、菲律宾新人民军甚至张春桥时的不同抉择（我们知道，关于毛思想还是毛主义，以及坚不坚持贡萨罗作为第六导师的问题在马列毛主义者中引起过不小的争论），仅仅是最近涌现出来未明子及其所谓的“工益”行动就导致大量的马列毛主义者不仅没有坚持自己的意识形态，反而被二道贩子的哲学术语砸成醉鬼，甚至不惜为其机会主义的行径辩护。我们也没有忘记，正是未明子同阳和平、佐伊等人的争论在马列毛主义者中引起了多大的波澜。还值得马克思主义者注意的是，有多少人试图沿着阿尔都塞的道路，把植根于对 60 年代中国的革命东方学

想象上升为不容置疑的真理，把阿尔都塞、巴迪欧甚至齐泽克的“新”理论转嫁到马列毛主义中。看来，反对“安托西修”并没有让马列毛主义永享天国的宁静，其内部倒是愈有分裂之势。左翼大团结同宗派主义的联合便是这样发生的。一边是反对“安托西修”，一边却把立场本就不同，只是在自称上一样的马列毛主义者们（此处是基于立场和路线的复数，而不仅仅是人数上的复数）强行捏在一起，造成大团结的幻象。这样的路线斗争和团结是醉酒的狂欢，而不是基于科学社会主义的判断。

不愿散去的幽灵仍然困扰着人们，旧日斗争中产生的意识和知识并没有因其产生环境的逝去而烟消云散。这就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目前背负沉重历史遗产的原因。问题的关键也在这里：是通过把国际共产主义斗争的经验及其结晶一股脑地继承下来，还是要将这些经验和结晶同当下中国资本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发展趋势结合起来，创造一种新的开端和斗争？这不仅是一个实际策略的问题，而且还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观问题。前一种态度事实上导致了不自觉的历史循环论——历史是不断循环的，斗争是不断循环的，只需要继承历史上出现过的斗争，踩着先辈的脚印走路就好了。这种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同斯多亚学派的区别只是在于，它并不认为世界的第一推动者是上帝或者纯粹理智，而是阶级斗争。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将辩称自己任命群众将要发挥的主观能动性——正如在批判其为经济决定论时他们同样会说的那样——与波爱修关于上帝预知和命运共存的辩词并没有多少分别：即使“主观能动性”能够充分发挥，它仍然始终被统摄在一个作为“上帝”的必然性统治下，至于必然性如何而来和在什么意义上存在，这是他们从来不愿意推论的（因此还没有达到经院哲学最初的水准）。在这种历史观的支配下，马克思主义失去了科学的内涵，破天荒地变成了信徒通过阅读就可以接近直观理智，进而直观历史必然性的圣经了。这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让理论倒退回尚且不如早期基督教哲学的水准。历史唯物主义既不是预见未来的天启宗教，也不是沉迷于创造过去的无限可能的时光穿梭机，**它关心的是经由过**

去历史实践发展而来，并将继续在众多轨道的某一条上延伸或发生断裂的现实及其可能性。现实不是僵死的事实集合，而是实践的过去、现在和可能的未来；可能性不是因信称义的神启恩典，而是根据当前局势和潜在趋势，通过知识显现所有潜流，力图以介入性的姿态成为马克思主义潜流的实现者。马克思主义政治组织的任务就是让社会主义的潜流成为活生生的事实。马克思主义的路线及其斗争不是纯粹精神的博弈，正如没有无产阶级就没有马克思主义一样，它的政治路线深深植根于马克思主义者所处的社会结构和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发展状况之中。这就是为什么马列毛主义者目前从事的纯粹基于历史遗产的斗争毫无意义，而那些值得赞扬的斗争（例如同“工益”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往往不能占据主导地位，反而有许多人持实用主义的骑墙态度。

列宁说，不要看一个人说了什么，而要看他做了什么。这句话并不意味着理论微不足道——理论恰恰属于“做”的范畴，只有把“做”理解为整体的理论和实践才能理解为何列宁同时又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根据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遗产所做的路线斗争必然带有理论的色彩，并且在之前的两个十年中极大地促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发展。但是不能忘记的是，即使在那个马克思主义者的同情者都极度稀少的年代，一些严肃的马克思主义者团体内部除了单纯的历史遗产斗争，还存在关于是否融工的路线斗争，以及是否力求合法化的斗争。这些斗争有些看来是十分幼稚的，有些又锐利地关切到我们的现在和未来，但无论如何它们都是具体的路线斗争，而具体的正是最全面的。一个马列毛主义者可以大搞身份政治，一个托洛茨基主义者可以是融工的践行者，这并没有什么可稀奇的。在以往的年代里，以历史遗产为基础而分立的各大马克思主义阵营中往往潜伏着具体的路线斗争，它向我们的存在挥手致意。在马克思主义者越来越意识到要进行自觉活动的今天，以历史遗产为界限的圈子式存在越来越无法满足马克思主义者的需要，现实简直是把我们拖在地上滑行，要求我们尽快赶上社会运动的阶

段性发展。这并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呼声》编辑部目前下辖的支部都是经由这样的具体路线斗争，从而自愿接受编辑部指导的。就在最近，桂林的一个马克思主义小组向编辑部说明了自己的情况，希望寻求一些建议。编辑部的一位成员是这样作答的：

你们的联络员同志已经同《呼声》接触了一段时间，《呼声》编辑部也基本了解了你们所处的环境和组织内部状态。从根本上来说，你们的组织潜在和实际地陷入了两种危险：1）理论上的相对进步和实践上的落后，这导致作为马克思主义组织的桂林小组向它的成员提出的要求同实际上的成员脱节，从而导致 2）组织内部处于分裂状态，各方面并不能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切实有力的行动。一句话，在新的阶段固守旧阶段的组织形式，这就是目前桂林小组的面临的首要问题。

具体地说，桂林小组似乎存在两种不同的倾向。一是受《呼声》刊物影响，有意向前进，做出进一步组织改变的倾向，二是宁愿保留以前的思想和组织方式，力图延续空谈作风，不愿意实际活动的倾向。实干派的一些成员已经意识到小组本身在理论和实践上的乏力，而空谈派的不作为和对组织事务的涣散态度实际上阻碍了组织的健康发展。谈到这一点，我还要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者对待派别的态度。

……

关键不在表面宣称自己怎么样，而是在当前局势下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如何将自己理解的马克思主义转化为行动。事实上，桂林小组目前已经遇到了这个问题——是要当改进组织生活的实干派，还是要当固守涣散状态的空谈派？这样的路线斗争正是最有意义的斗争，才是目前中国马克思主义运动最紧要的斗争之一。现在的你们就在路线抉择的十字路口。

拒绝简单地将路线斗争概括为纯粹保卫历史遗产的斗争，而是根据现实具体地判断路线斗争的形式和内容，这就是《呼声》一贯主张并且呼吁全体马克思主义者要做的事情。左翼大团结的支持者和宗派主义者同时陷入了不

加思辨地捍卫历史遗产的沼泽，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如此亲密地结成互称“同志”的同盟，并且攻击任何试图改变目前状况的马克思主义者。

根据杂志一贯做出的社会分析和政治讨论，《呼声》编辑部认为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目前面临的最大路线问题不是别的，正是：**要向布尔什维克看齐，致力于建立富有有机关系的革命政治组织，还是要向一般的学生社团学习，仅仅建立一个围绕兴趣爱好和交友轨道运转的空谈家组织？**《呼声》公开反对任何拒绝前者，拥抱后者的个体或团体，无论他或他们是马列毛主义者还是所谓的“安托西修”。同样，《呼声》公开宣称自己的思想来源并非单一地来自某个历史人物，而是根据编辑部成员的长期理论学习、讨论和实践，在不断的活动中形成了一套准则。这种准则是别的团体所缺乏的，它正是《呼声》赖以活动的思想基础。想要在这个讨论组织问题的小册子中详尽地阐述这套准则是困难的，但对组织问题的讨论本身以它为标尺，并且在《呼声》的其他出版物中无处不在。

我们在自己的第一篇政治评论《从郑州到白纸运动》中提出“无产阶级的经济斗争日益表现为大规模的暴力冲突，这个新形式表明工人斗争进入了新阶段”，这要求马克思主义者对新的阶段做出判断，提出自己的任务。《呼声》编辑部认为，目前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要同三种马克思主义内部倾向进行坚决的斗争，它们分别是调和派、托古派和盲动派。主张左翼大团结的调和派已经在上面得到了应有的批判。托古派是什么呢？那就是不去思考当代资本主义孕育的新生产和剥削形式，不愿或不能理解 21 世纪的无产阶级，却在叙事上划分一个中华第一共和国（一共）同第二共和国（二共）的纯粹断裂，把革命的一切希望都寄托在毛泽东及其思想作为激发群众对革命的想象力来源的地位上。这个历史叙事是对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应激反应，与之最为契合的理论态度便是简单地将国有制指定为社会主义（尽管在这一根本基础上会有其他修补性的说辞）。历史确实并非一个一帆风顺的进化过程或千回百转的轮回，其间有飞跃或断裂的存在，但是，这些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

结果不能被意识的想象所取代，即使这意识是潜在具有革命性质的。与其说对旧光辉岁月的美好设想是走向社会主义的直接道路，不如说它在 21 世纪中国新无产阶级的诞生过程中充当了一种剩余文化的角色：无产阶级处于自己的形成时期，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无力作为组织起来的力量干预这一进程，因此无从效法列宁，将任何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灌输进去；无产者对修正主义背叛革命的质问不是基于对改革开放的系统研究，而是根据自己被压迫、剥削的既有事实，通过上一代深受国家父爱哺育的旧工人阶级的联系，将对“前三十年”作为“国家主人”的美好想象转化为自己的正当防卫武器。作为中国最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无可避免地影响到了绝对多数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就像他在 60 年代也被欧洲的众多激进分子奉为革命的道成肉身一样。但是，对修正主义的愤慨和对革命的狂想不能喧宾夺主地把历史唯物主义挤到角落里去，对新中国采取的历史断裂甚至在毛泽东本人的斗争经历中都是难以成立的。例如，许多马列毛主义者耳提面命的两条路线斗争，难道只是在 60 年代才开始形成的吗？如果不去谈到新中国建立前后的阶级斗争、民族资产阶级的影响以及旧帝国制度同新中国行政制度的异同，就无法理解自建国就时而潜伏，时而凸显的“两条路线”，而这正是表现为党内左右两派周期性的主导统治。改革开放同它的前三十年之间并没有存在一条开辟历史界限的鸿沟，恰恰相反，后一时期是前一时期斗争的结果和发酵。只有在认识到这一事实，我们才有可能认真地讨论改革开放时期同计划经济时期国家治理的差异。马克思主义阵营里的托古派把毛泽东放到一个至高无上、不可置疑的地位，实质上是在歌颂共产主义版本的田园牧歌。

与托古派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盲动主义者，这一思潮在目前具有特别重大的批判意义。盲动派分子鄙夷进一步的理论研究，认为一切的问题只是在于行动、组织、融工和实践，因而自命为真正的实践派。其实，这真正的实践派和《共产党宣言》中提到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一样，他们表面的“革命活动”掩盖了自己被资产阶级思想俘获的实质。盲动派认为现在的理论“已

经足够了”：只要自己一活动，从天上掉下来的理论就自动涨幅，仿佛世界就是一场电子游戏，他们每做一个任务就必然获得角色经验似的。盲动派一味地号召串联和融工，像酒桌上吹牛一样夸耀自己“至少有实践”，把它当成自傲的资本和避免批评的保护盾；他们高呼马列毛主义，却置列宁的话于不顾：“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不用理论来分析、综合实践现象，不“使现存世界革命化”[1]，而把现象本身视为实践的全部，这种实践和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进行的资本主义实践有什么区别呢？托古是为了实践，实践是由于认为理论上的托古已经足够指导革命了，这就是为什么托古派和盲动派总是在同一个人身上表现出来。究其根本，盲动主义把作为整体的人分为两部分，要求被资本主义统治的直接的人支配作为马克思主义思想者的人，这就是它必然在革命的道路上粉身碎骨的全部秘密。[2]

四、在组织之前，或组织作为政治延伸

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一个特点是，在它里面已经实际地产生了若干个路向，但却缺乏对这些路线的支持者进行统摄的政治组织。这就意味着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迫切任务不是凭空创造一些新玩意儿，而是要认清目前饱受

---

[1] 《德意志意识形态》。

[2] 在另一篇文章中我曾经写道：“这种表面上肯定马克思主义哲学，实际上否认任何哲学内容的观点没有注意到，《提纲》的前十条内容不是外在地指责哲学家的不作为，而是进入哲学史的传承，通过一种新的解释世界的方式批判近代哲学（无论唯心主义还是唯物主义）。这样，马克思不仅没有抛弃哲学，反而肯定了哲学对实践的先在性——首先是‘解释世界’，然后才能提出‘改变世界’这个关键问题。正是由于把‘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解释成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不仅没有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统一，反而更为严重地割裂了理论和实践。马克思主义从来不承认先验的理论知识，因而也不可能承认任何革命实践可以预先被确定，不承认任何人可以在没有革命的理论时就进行科学社会主义意义上的革命实践。马克思批判费尔巴哈‘仅仅把理论的活动看作是真正人的活动，而对于实践则只是从它的卑污的犹太人的表现形式去理解和确定。’把这句话倒转一下，这就是对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些人的最好注解：仅仅把资本主义的实践形式定义为先验的革命形式，将其视为真正人的活动，而对于理论（不仅作为体系，而且还是认识活动）则只是从它的中世纪和近代思辨形式去理解和确定。”

诟病的“左圈”中实际存在的政治潜流。“左圈”不是什么洪水猛兽，也不是纯粹的小资产阶级狂欢场所：它的发展就意味着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它和任何社会存在一样，都是历史的，因而是实践的产物。在无数团体的发展过程中被强烈谴责的那种“左圈”或“网左”习气不是网络本身的性质、阶级出身或者亚文化“圈子”导致的，而是马克思主义作为现实力量发展的早期阶段的特征。谁说在俄国马克思主义发端之时没人拿马克思主义当消遣和纯粹的知识趣味？谁能说在网络被发明之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就没有既不学无术，又拒不服从任何组织纪律的马克思主义者？这种厚古薄今的态度不自觉地效法了高尔基的缺陷——列宁批评他在《母亲》中把描绘了革命者形象描绘得过于伟岸，而我们世纪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则热衷于把过去的革命者理想化，对自己身边的刚成长起来的这一批却采取最不屑的敌对态度。事实上，他们对自己口中的“左圈分子”或“网左”的道德批判充其量是装模作样的清高，在批判后就陷入对本国革命力量发展的深深自卑，给自己的不作为提供“理论上的”理由。批判“左圈”和学生是“小资产阶级”的那些马克思主义者完全不理解社会历史的过程和阶级分析，他们仅仅是把小资产阶级当成划分敌我的词汇，而无视了它任何的政治经济学内涵——他们的一贯论调是“脱产者就是小资产阶级”。这样，原来建筑工人家里刚出生的婴儿也成了小资产阶级！无产者在他们的脑海里就是这样实现阶级迁跃的。

由于没能正确认识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那些反对“左圈”的团体无一例外最后都失败了，并且总是被它们的后继者继续耻辱地称为“左圈”的一份子。这个称呼是绝对正确的：没有哪一个人在和现时代的（也就是是具有政治生命力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进行接触的同时可以不在“左圈”之内。“左圈”就是中国马克思主者群体的同义词。是的，要对“左圈”进行批判，但这不意味着仅仅批判小资产阶级，而是要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内部的错误倾向进行最坚决的斗争，须知即使无产阶级内也会出现各种偏移。前面已经谈到过这些错误倾向的主流。只有在认识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情况后才能

自觉地投入到政治建设中，为建立一个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组织做实际的工作。不过现在提政党为时尚早——因为甚至连像样的地方小组或网络小组都还没有几个。在运动初期，小组的建立和发展往往带有极大的偶然性质，也许是有一个极富魅力的主心骨，也许是一群爱好历史人文的文艺青年逐渐转型，又或者是各种机缘巧合导致几个想法各异的马克思主义者聚在一起等等。各地社会结构导致的背景性差异、学校人际关系的阴差阳错、各自的性格，甚至是纯粹的运气等等都有可能导致一个小组建立或是不建立，这里没有一条社会主义的铁律在指引马克思主义者，而且光靠恒心和意志并不能做成事情。但是，我们正是要善于从这些极端的个例中提取出较为一般的要素，将其同马克思主义政治组织的内在要求结合起来，用它指示小组的发展方向。

这本标题里带“组织任务”几个字的小册子并不打算从具体事例推导这些一般要求，否则就太臃肿了。我们只是把它当成既定事实，并且要将这一事实提升到马克思主义的水平上来。小册子的结构设置已经表明，在目前谈论“我们的组织任务”时，精力首先应放在组织之前的那些问题，即提出任务的前提，而不是立马操盘具体的组织机制或短期目标。我们缺乏的不是一部组织术的工具书，而是对组织应有基础的考察。毋宁说，对组织具体形式的表述已经遍布于对错误倾向的反对中了，因此，这个小册子实际上是对现在和将来的活动者们的呼吁。重提苏格拉底的教诲仍是有必要的：认识你自己。对人和他的世界未经反思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建立组织团体时总是认为自己足够“强大”，已经成为了先锋队或至少摸到了先锋队的边，然而正如我们以前说过的：**先锋队不是一个组织或机构的别称，它不能被永恒地拴在某个党的大门前；只是因为党成为了这样一种历史现象，先锋队的名字才被赋予给它。**只有在认识到组织工作作为政治认识的一部分，并且实际参与进去，亲自处于组织和个体、知识分子和群众、政治和生活等张力中时，马克思主义者才能认真考量具体的组织形式。而在已经建立的小组那里，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能不能从革命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反思原本并不牢靠、带有相当大偶

然性的组织基础。这就是说，对组织基础的反思和组织的建立在时间上往往是颠倒的，但**在逻辑上**反思——那么，在这里更准确的就是“思考”——却必须在先：**必须使组织成为政治意识的实体化**，这样才能使之同其他一般的组织和社团划开界限，成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组织。

*　　*　　*

小册子附有两篇文章：一篇是弗兰尼茨基的《论实践问题》，一篇是普列汉诺夫的《论策略》。前一篇文章在反驳盲动派的基础上，可以用来打磨新的“实践”概念，不至于陷入将它庸俗化理解为“做事情”或“在线下做事情”等等。作为俄国马克思主义之父，虽然普列汉诺夫后来反对十月革命，但在早期同民粹主义者和经济派的斗争中，他的卓越贡献是列宁本人都大加赞赏的。这里选用的《论策略》是对那些认为马克思主义者不必提出什么任务，只需要随波逐流的人的有力回击：那些认为只要目标都是打倒资本主义，因此就不应该因“策略”问题发生内部分裂和斗争的人，**早在《火星报》的年代**，就被列宁和普列汉诺夫领导的编辑部坚决斗争了。

论实践问题[1]

普雷德拉格·弗兰尼茨基

而生产生活本身就是类生活。这是产生生命的活动。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卡尔·马克思

人类思想的每个阶段都被对应的历史和思想传统束缚，这自然是非常容易理解的。这正如过去几代人的传统至今还压印在生者对自己生活的全部领域以及思想的各分支的认识中一样。当我们思索我们的存在及其意义时，会感觉人类的整个智识力非常复杂，往往一眼望不到底，就像人类意识的历史以及意识本身的理论和关于一般存在的理论一样。它的意识、思想和理论第一眼看上去是某种同人类的物质和历史存在相分离的东西。这体现在不同文本对下列问题进行的判断：理论和实践（pratica）的关系；实践在理论中的反映；理论相对于实践的滞后性；这一个对那一个的首要性。

连思想的一定差异也是属于某些传统，尽管进一步的分析可能证明这个判断受制于一些条件或干脆不成立的结论。例如，存在与思想的区分是一个历史区分。如果基于词源学和哲学上的用法，“存在”这个范畴表示某些东西存在，或某些东西以什么样态存在，那么范畴指称的既属于现实，又在自然或历史的意义上也属于思想。把“在我之外”的自然和现实同存在范畴相提并论，将其放在意识和思想的对立面，这是完全不合适的。

很容易理解这一点：“存在”的范畴可以（实际上也确实如此）以极其不同的方式确定下来，用非常多样的内容规定下来，甚至也可以被限制在自然和历史的范围内。但是，如果只能在这样的范围内指认存在，那么就会得

[1] “On the problem of practice”, Praxis, 1965,1, pp. 41-48.译自 Mario Lupoli 的意语译本。

到一个合逻辑的结论：思想和意识不存在。我认为在这样的基础上是不能解决这个问题的。我们试图从这个角度解决的这个问题，即实践（pratica）或实践（prassi 或 praxis）[1]的问题，也有力地压在传统的脊梁上。上面这种提出问题的方式也显示出许多人出发点的片面立场。像上面那种情况，一个简单的“实践的”行动的一系列有限的和局部的情况在我们看来就是没有任何理论的，所以大量的理论关注和“实践”无关，而是似乎与之分离或对立。

如果我们把我们正在研究的这个复杂材料——人类历史——简化一下，那么事情就是这样了。在个别的、简化的例子中，似乎很多情况下我们都有实践而无理论，二者不是脱节就是仅仅具有单向的关系。但是历史现实要复杂得多，“实践”范畴也表现出巨大的复杂性。我们在这里想要考察的不是一些特殊的实践活动，而是作为人类基础的实践，作为人类的哲学特性的实践。跟随马克思的脚步，我们在这个意义上把人类视为卓越的实践（prassi）存在，视为自由地和有意识地改造自身生活的存在。实践就是**由其自身**（eo ipso），是怀抱人类存在的全部领域的多义范畴。我们不需要在这里重复自马克思以来就说过千百遍的东西，这是所有思辨的前提：人只有通过改造他的自然和社会现实才能存在和发展，而他自身也在这个进程中被改造了。在这里，我们感兴趣的是实践概念和理论的关系结构以及实践范畴表现出来的实际的人类关系的结构。“实践”是某种从本质上决定人类的存在特性的东西。这就是它在本体论-人类学上的意义所在。

如果我们不把历史看作一个在每个时期都最激进深刻地改造历史和自然存在的（有时它具有这样的前景，有时则没有）、连续的、辛劳的意识-无意识进程，那么我们就不得不否认任何以理性方法解释我们的起源和生活的主要和次要趋势的可能性。动物也“改变”世界，不过仅仅是与它们相对不

[1] 在弗兰尼茨基看来，pratica 是一个更具有认识论意义的词，而 prassi 或 praxis 则是本体论意义上的“实践”。文中未标明处均为 pratica 一词。——杜临注

变的结构相符。这就是说，这种没有意识的改变缺乏自由，不以发展为目的，只是以一种固定的、无计划的、无控制的、非革命的方式进行改变。这个“改变”中没有历史进程，只有趋势的一次次重复，“时间性”仅仅被视为生物学上的生长和衰老，这种改变是生物学的，而不是历史行动——所以它不是创造。人按自己的结构改变世界，不仅是物理和生理结构，而且还有历史结构。他对现实的改造同时也意味着自己对历史和个体结构的影响的改造。他对的世界的改变不是一个循环，而是一个进程。正因如此，人是唯一具有创造性的存在。这导致他自己的存在和本质都受制于自己的创造。

如果我们通过实践概念接受人的这种创造性的总体性，那么根据人的实践的可能性，我们不能不得出结论：人创造自己的历史和自己的历史生活。这些可能性永远只能是历史的：例如现实的生产资料，科学技术、社会组织、个体的文化和技术状况、国际关系和影响等等的发展水平。因此，如果采取存在主义的公式“存在先于本质”，那么我们也能很容易地将其颠倒过来，声称本质同时也先于存在。这是因为人不仅仅是一个独立于自己所处的历史结构和进程而创造自身的个体。他和历史上任何关系所创造的尺度一样伟大。实践涉及个人生活的所有领域，人在本质上是一个“实践的存在”。在童年嬉戏中，在工作中，在家庭关系中，在科学实验中，在艺术创造中，或者在他的历史行动中，人总是与自己的对象（自然、其他人等等）处于一种实践的、立即可以感受到的关系中，而不是简单地处于一种沉思关系中。如果实践本质上是有意识的、或多或少自由的和有计划的创造，是对现实（这种现实不仅仅是思想的现实，而且尤其是人类存在的媒介的现实，即自然历史的现实）的改造，那么我们再重复一遍，这个概念包含了人的整体，包含了他的家庭，包含了作为生产者的政治、艺术和研究劳动等方面。在全部这些实践关系中，人类也或多或少明确地、有意识地用理论方式表现自己。没有某种“理论”，没有一定的目的、行为、概念和想法，人类就不能同世界建立任何实践关系，哪怕最简单的也不行。总之，只有在人类的实践生活同时也是理论生活的时

候，它才能从本质上证明自己如此这般。实践概念用这种方式展示了自己的三个基本方面：具体的-可感的、理论的-抽象的、情感的-体验的。由于实践必须满足某种需要，因此如果没有某种确定的情感态度，它就是不可能的；如果实践不感性地改变和创造对象和现实，那么它也是不可能的；最后，如果实践不是有意识的、有计划的、理论的和自由的，那么对象的感性变化是不可能的。

蜘蛛的活动与织工的活动相似，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他不仅使自然物发生形式变化，同时他还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这个目的是他所知道的，是作为规律决定着他的活动的方式和方法的，他必须使他的意志服从这个目的。[1]

只有在实践被理解为感性活动和理论活动的统一时，才有可能把人定义为实践的存在。机器（即使是最简单的仪器工具）的运转就是理论的运转或实现。正如理论（即使是最简单的）是一定的感性和理论创造性的升华。这两种要素在实践中是相互的、功能性的，是互相制约的。抽象思维的相对独立性使之有可能落后于或领先于具体的-感性的活动。同样，人类感性活动（首先是生产和历史活动）的复杂性和自发性使我们很难对全部这些进程产生一种背景性的理论观点。由于实践概念包含了感性和理论，把二者对立起来，视为两个理应统一起来的两样东西并不合适；这个实践被理解为人的基本功能，它本身就包含了这二者。把它们分开就有可能导致一种不包括意识、假设和理论的实践类型，就像有可能导致一种不涉及人类感性活动的全部经验的纯理论一样。这样的实践（prassi）是动物的实践，这样的理论毫无意义。

[1] K. Marx. Il capitale, Volume I, Terza sezione: La produzione del plusvalore assoluto, ed. it. pagg. 195-196, Editori Riuniti 1973

可以理解，这在程度上会有细微差别。**在实践的最高创造时刻，在统一的基本单位上可以具有不同层次的差异。同样，如果我们考虑到参与其中却不能以历史为整体进行参考，不能把历史创造当作统一的、整体的行为或进程的个体（历史分工有关），那么也可以把理论活动分离出来。**

把这两个要素提出来并列考量。就意味着人不是一个总体的存在，他的历史也不是一个总体的创造，而是他创造了各种独立和平行的历史——技术的、物理的、科学的、法律的、哲学的等等。即使迄今为止还存在的分工使得所有这些活动领域都存在相对独立性，上述分工也会破坏作为个体和历史存在的实践存在的人的辩证统一。历史是人的整体生活，因而是人改变世界和创造新的历史结构的整体历史：从中我们也可以理解历史-自然现实、人本身及其极丰富的造物（艺术的、历史的等等）。由此可见，正如对各时期进行的具体分析所展示的一样，人的任何感性活动和理论活动之间的鸿沟（也就是通常所谓的理论和实践的差异）从来没有存在过，而且也不可能存在。因此，人的任何历史地确定的层面和任何实践层面都是被相应的感性活动和理论活动所构建的。人的物质、社会和理论实践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和相互影响。历史是人类的整体工作。没有哪一项人类活动是本就孤立存在的。不考虑整个历史时期、人作为一个整体的历史存在及其作为实践的存在的基本存在的完整性和多样性，就不可能理解任何东西。

马克思不仅形塑了只存在一种科学——历史科学——的观点，而且还对拜物教意识是一种明确的、低层次的感性存在这一论点做了同样的事情。“理论问题的解决是实践的任务，并且通过实践来实现，正确的实践是真正的、积极的理论的条件。在**拜物教**中就体现了这一点。拜物教徒的感觉和希腊人的感觉不同，因为其感性存在是不同的。只要人的本质感觉或自然的属人意义，即**人的自然**感觉，还不是从人自己的劳动中生产出来的，那么感觉和精

神之间的抽象敌意就无可避免。”[1]这种与人的“实践性”的整体特征有关的论述，或者与作为人的实践发展的历史有关的论述——不管在社会分工中是否有些更适合“理论家”，有些更适合“体力劳动者”——应该被接纳为分析和解释历史的根本。

如果原始人的拜物教可以被解释为他们对现实进行的感性改造的低水平发展——这只向我们说明了他们的实践层次（包括这种拜物教意识在内）很低——那么，任何其他意识和历史存在都可以被这样展示出来。就改造的-感性的和解释的-理论的层面来说，古代欧洲的手工业、航海业、战争和其他标志着改造形式的行为的发展水平已经达到了比拜物教社会高得多的层次了。但是，即使是古代历史实践的层次也因生产力和技术、社会结构和组织，以及概念的整个发展被严格限定了。在那时，人对世界的改造度及其实践经验只能得到对法律、因果性的不同形式的概念，只能把抽象概念当作自己的研究对象，使人们不断惊叹于古代的伟大理性。但是，对自然过程的控制度（它和现实改造唱对台戏）仍然很低，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受制于对现实问题的外部感知的关系。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的始基具有可感的特征：气、火、水等等，连原子和分子的存在也是在感知的基础上构思出概念的。同样，他们的社会思维也仅仅是社会存在——即**城邦**——的一种表现，而**城邦**和部族的结构具有明确的局限。

不必再去讲现代历史及其对机械和机械化概念的发展了。我们在这里只提请注意：只是在实践发展的历史层面，工人阶级才不仅成为有意识的主体，而且成为历史的真正创造者——这意味着人类实践的发展到达了使雇佣劳动，也就是使工人阶级成为可能的地步——当改造的-感性的、经济的-生产的时刻在人类实践中占据其应有的位置时，一个可能的历史概念才得以确立。

只要历史的主要创造者还是那些与生产没有密切联系的阶级或集团—

[1] E. Fromm, Il concetto di uomo di Marx. Con una traduzione dai Manoscritti economico-filosofici di Marx di T.B. Bottomore, ed. originale, New York 1961, pagg. 148-149

—经济时刻和经济生产在本质上就无法进入理论考量。一定历史存在和历史实践的一定意识必须首先把重点放到人类活动的“更高”形式的存在上。过分强调理念、意识和其他精神造物者，这就是一定的历史实践存在的必然结果。当代历史实践及其对现实的高度改造和随之而来的高水平科学技术越来越在我们的世界中创造一个至今还没有被认识的统一体，并且与之互相依存，因此也在理论和社会层面上创造了与我们的“感性存在”层次相对应的概念。

无论历史分工在多大程度上、以何种形式导致一批人更多从事感性活动，另一批人更多从事理论活动，历史实践的一定层次都依然包括感性和理论活动的一定实现。而最抽象的哲学思想本质上包含了人类改造和创造历史-自然的完整活动。人的实践——就是他的历史，他的劳动——具有这两个互相关联的主要方面。因此，实践的反面不是理论，因为实践事实上正包括理论。实践的反面只是与实践无关的“理论”，是有限意识的幻想。同样，就人的本质和存在的发展是实践，也就是不知疲倦地不断辛勤、自由和创造性地改造人所立足的现实而言，对人的假设的验证不可能是别的，正是实践、劳动和人类生活，是其思想和行动无休止的交锋，是感性和理论活动的统一。

只要我们有创造力和自由的生产，我们就有实践。如果理论仅仅是被感性活动单方面决定的，并且只是沦为一种反映，那么人就不是一个自由创造的存在，不是实践的存在。实践正隐含着指导的时刻、预见、设想、计划、控制等等。只是由于理论思想既是一种创造，也是对事物的感性和物质改造，我们便在其中发现了人的整体实践的另一面。正是在这里，我们获得了作为有意识的存在的意识的最深刻定义。意识是人对世界进行感性改造的时刻，这种改造只有通过意识才能实现。一个以另一个为线索，一个以另一个为条件。这就是为什么人类实践的层次基本对应于其具有的一定历史意识的层次。这就是为什么从本质上说，历史意识，即特定历史世代的意识，永远不可能领先于他们的实存，他们的历史存在。每代人的意识都是其历史存在的意识，如果不是这样，历史实践就成为了不可能。历史意识和感性实存之间的某种

矛盾、分歧等等在一定的时期总是能够必须必然发生。原因很简单：人不会永远满足于自己的实存，新的力量（物质的和精神的）的发展产生了新的观点、需要和任务。但这不会招致完全的分离，因为如果这样，那就意味着人的实践本身的分离。如果这样那就不会有任何前景和出路。目前为止仅仅有个例是这样，历史地说这是不可想象的。

如果我们已经看到人的一般生命是自由的和有意识的行动，即实践的同义词，那么人的整体性和总体性就在这些时刻的统一中找到了。换言之，人是“物质的”存在和“精神的”存在的说法只是达到一定层次的、渐进的历史分工导致个体或集团从事一种或另一种活动的必然。

人发现自己被束缚在机器上或者被先进的专业化容纳进去的情况意味着他们失去了一些重要的特性：实践的存在、广泛的存在、多样的存在和理论能力，以及另外一些同历史和其他人的多方关系的感知特性。这样的个性分裂是并将永远是人类在被逼迫情况下为追求利益而进行各种野蛮活动的最好工具。这就是为什么在今天，要在提出改造从古至今的人类实践——阶级统治和对人进行的一般统治——的同时，必须优先考虑把作为一种实践存在的人重新整合进去。

论策略[1]

格·瓦·普列汉诺夫

策略一词是政治活动家从战争艺术理论家那里借用来的。大家知道，战争艺术就在于使统帅拥有的**手段**适合于他追求的**目的**。至于策略一词的本义，人们把它理解为调遣部队来作战并在会战时指挥部队的艺术。这个概念较之同政治策略一词相联系的那个概念要狭窄得多。政治活动家常常把军事理论家称之为战略的东西叫做策略。但是不论怎样，任何人都不难承认：政党或军事长官所追求的目的是一回事，使这个党或者这个统帅拥有的手段适合这一目的则是另一回事。对目的的清楚认识还完全保证不了手段的巧妙运用。谁出发去作战时以为他只要知道为什么打仗便足够了，他就有遭受惨重失败的危险。

对这个公理的认识在社会主义文献中表现为党的**原则**和它的**策略**之间的区别。原则上彼此一致的人们可能在这个或那个策略问题上产生分歧。这是不言自明的。因此试问：是否可以把策略分歧算作其存在会使某些政治活动家可能不再属于同一政党的那些意见分歧呢？

如果用粗心大意的态度看问题，也许觉得这个问题除了否定之外不能有其他回答。策略问题不应该导致分裂；如果人们原则上彼此一致，如果他们都追求一个共同的目的，那么他们就是同志，而且应该始终如此；由于次要的局部问题而分裂对他们就是有罪过的……

对社会主义一知半解的人通常都这样说。而他们之所以这样说，自然是因为一知半解使他们看问题粗心大意。他们以为，策略问题同原则问题之间

[1] 原题《总论策略，部分地论尼古拉的列阿德将军的策略，特别是论波·克里切夫斯基的策略》，原载于 1901 年 11 月《火星报》第 10 期，译文来自普列汉诺夫的《旧<火星报>论文集》。——杜临注

隔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实际上这种鸿沟不存在，这就说明为什么策略分歧越过某种界限会变为原则分歧。

要证明是不难的，只须举出法国就够了。饶勒斯过去和现在都确信，他只是在策略问题上同盖得、瓦扬和其他革命社会民主主义的拥护者有分歧。在某种意义上他也许是正确的。如果把原则理解为社会主义的普遍原理，例如资本家剥削工人、剥削应当消灭、为了消灭剥削必须使生产资料社会化等原理，那么几乎可以有把握地说，饶勒斯真心实意地赞同这些原则。然而，任何人现在都明白，盖得和瓦扬不可能同饶勒斯走在一起。在这些老战士和冯·米勒兰男爵阁下[1]能说善辩的朋友之间存在的**策略**分歧，无疑现在达到了已开始成为**原则**分歧的程度。

问题在于，除了上边列举的表述和论证社会主义最终目的的那些原则之外，还有为此目的而斗争的策略所依据的那些原则。对后边这些原则彼此看法有分歧的人，不管他们在社会主义普遍原理上有多大的一致意见，也不可能走在一起。譬如就拿空想社会主义者来说，他们把阶级斗争看成最大的灾难，硬说完全停止这种斗争是无产阶级解放首要的实际条件。社会民主党人即使当自己在确定最终目的上同这些社会主义者完全没有分歧时也不会认为他们是自己的同志。前边我们说过，对目的的清楚认识还完全保证不了善于运用手段来达到目的。现在我们补充说，正因为如此不能把最终目的问题上的意见一致看成是将实践的战士团结在一个政党的旗帜下的**充分**条件。

诚然，饶勒斯及其同伙宣布自己同盖得主义者或布朗基主义者一样，都是阶级斗争始终不渝的和坚定不移的拥护者。但是他们的例子比任何别的例子都更好地表明，不是任何承认某种原则的人在自己的实际活动中都遵循它。

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要求提高工人的阶级觉悟。所以不能认为那些把不仅不会提高这种觉悟、而且直接使这种觉悟变得模糊的策略强加

[1] 大家知道，米勒兰不久前被奥地利皇帝授予男爵头衔。

给工人政党的人是阶级斗争的真正拥护者。在这里，为什么正是这些人坚持这种有害的策略；是因为他们在欺骗自己，还是因为他们想欺骗别人，几乎都一样。主要问题在于他们在自己的实际政策中企图把无产阶级运动拉向后退。革命社会民主党同这些人－饶勒斯主义者无疑也在其中－是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的。

为了使两个社会主义团体（或组织，或派别，或政党）能够联合起来有利于事业，因此，除在对待最终目的方面意见一致之外，必须使它们当中任何一个团体都不坚持可能会使另一个团体（或组织，等等）觉得不利于提高工人的阶级觉悟的那种策略。这是不可以也不应该越过的界限。两个团体之间的策略分歧一旦越过这个界限，分歧便具有原则性的意义，那时分裂就会成为不可避免的了：阻止分裂意味着危害事业。

从我们的观点看来这个问题就是如此。不过我们不应忘记，我们的观点未必可以承认是正确的。大家知道，我们是沾染了“教条主义”、被盲目信仰弄昏了头脑、而且还犯了一大堆滔天大罪的宗派主义者。因此，听听一个由于造物主没有按照我们的形象和模样创造他而有充分权利感谢造物主的人的话，对我们将是有益的。此人就是波·克里切夫斯基。

他在第 10 期《工人事业》杂志上刊登了一篇文章:《原则、策略和斗争》。他在文章中阐明了自己同《曙光》杂志和《火星报》的意见分歧。在阐明过程中，被他提到首位的是这样的问题:**“原则和策略之间的正确的和正常的关系是怎样的以及要如何理解策略的本来意义”**。这恰恰也是我们所需要的。且听听克里切夫斯基的话。

他说:**“正确的策略是指明运动的目的的诸原则和运动由此发生的种种具体条件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

克里切夫斯基给了我们这个定义之后，补充说，他所谓的策略这里是指“活动的总的**指导精神**，活动的**哲学**，可以说，它不同于活动本身，不同于实践活动的**一般性质**意义下的策略，因而更不同于作为**技术**的策略，不同于

活动的一些个别的方式和手段”。

就是说，我们看到三种类型的策略：(1) 哲学策略；(2) 活动策略；(3) 技术策略。且把“技术”放在一边不予考虑，我们仔细看看前两类策略。

从“哲学策略”开始。根据克里切夫斯基给它下的定义的意思可以得出，（党的）活动哲学，它的指导精神是指明运动目的的诸原则和运动由以发生的种种具体条件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而既然完全有权可以把指明运动目的的诸原则称为指导原则，又既然这些原则显然无非是指导党的活动，因而也就成为这种活动的指导精神，那么我们就得到以下意义深刻的论题：

（党的）活动的指导精神，这种活动的哲学，是活动的指导精神和这种活动得以进行的那些具体条件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

什么是 A？A 是 A 和 B 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我不知道读者您怎么样，不过我们不是这种“哲学”的爱好者，我们以为，如果波·克里切夫斯基不妄谈“哲学”，而是简单地表达它想表达的那个简单的思想，即如果他说，社会主义政党的活动应该不仅决定于社会主义的普遍原理，而且也决定于周围现实的特定条件，那他就会做得好得多。这种表达方式会具有一种不可争辩的优点，即它完全不会有……“哲学的”**胡言乱语**“成分”。当然，它也会有巨大的缺陷，即它会导致“活动策略”同“哲学策略”完全融合，那时我们就只会有两种策略。然而波·克里切夫斯基能容忍这种尴尬局面，令人宽慰的是他还备有两种类型的策略，计划策略和过程策略。

我们的作者宣称：“**计划策略**自然只能建立在诸原则的基础上，还建立在活动的最一般条件的基础上，例如在俄国就建立在专制制度存在的基础上”。因此这种策略是不适合的，它归根到底会导致有害的动摇。波·克里切夫斯基确信，当李卜克内西拿计划策略同当年维也纳的参谋会议主席为正在同法国人打仗制定的那些计划相比较时，他很中肯地评价了这种策略。李卜克内西说：“这些计划从某种意义看是无可指责的，但它们不适合于这个场合，法国的将军们没有可爱到根据维也纳参谋会议主席的设想行事，于是战争就按

照艺术的全部规则失败了。”

波·克里切夫斯基根据这一切最坚决地谴责“计划策略”。他声称：“总之，看来《火星报》和《曙光》杂志倾向于把策略看成是预先制定的和不变的活动计划。我们就在策略中看到**同党一起增长的党的任务的增长过程。**”

同党一起增长的任务的增长过程！波·克里切夫斯基这里说的是怎样的任务呢？显然是策略任务。由此可见，按照他的观点，**策略是同党一起增长的策略任务的增长过程**。策略就在于策略任务的增长。这真是无与伦比！简单的头脑永世也想不出来！

我们这位策略家——看来他并非命中注定同党一起增长——拿李卜克内西做挡箭牌完全是白费气力。为了给这种策略找到根据，他本应首先指明，这位已故的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按其实践观点是同他接近的。然而要使我们相信这一点是困难的，我们清楚地记得，波·克里切夫斯基在德国报刊上所说的关于法国社会党人策略的某些见解如何激怒了李卜克内西。因此我们就不去管李卜克内西，而来讨论我们的作者。

李卜克内西的话使他产生了深深的误解。他以为同奥地利将军作战的法国将军轻视**计划**，而且也像他一样局限于这样一种深思的见解：策略是与战役进程一起增长的策略任务增长过程。然而克里切夫斯基不妨看一看例如拿破仑一世著名的回忆录：他会从中看到，那位使奥地利（而且不止一个奥地利）遭到最惨重失败的法国统帅如何细心思考以及如何认真制定自己的战略计划和策略计划。拿破仑不仅不敌视“计划策略”，而且坚决主张在认真制定计划时应该事先采取防止各种各样偶然事件的措施[1]。如果当年有某一个深思熟虑的克里切夫斯基忽然想使他相信，“计划”是小事，成功的主要保证在于策略是发展的策略任务的增长过程等等，那么这位专制的科西嘉人大概会迅

[1] 请波·克里切夫斯基注意，拿破仑事先制定的不仅有策略计划，而且有战略计划，也就是说不仅有个别战斗的计划，而且有**整个战役**的计划。

速地用他那通常的士兵式的无礼态度粗暴地打断他。

从战争历史上的所有英雄中，我们只知道有一个人多少接近波·克里切夫斯基的理想。这就是尼古拉的阿列德将军，即被认为是列·托尔斯泰伯爵写的著名诗歌中的利普兰季所说的那个列阿德：

不需要聪明人到那里去，
您派个列阿德吧，
我看……
看来列阿德完全鄙视“计划策略”：
列阿德突然无缘无故地
带领我们直奔桥头，
喊着乌拉冲锋！
正当我们“乌拉”声在喧哗，
后备队却没有跟上……等等。

一句话，胜利不愿意向马尔斯的天真无邪的儿子发出微笑。假如波·克里切夫斯基记得他的不光彩的历史，他也许不会写出从此以后有名的“历史转变”，这种转变就是真正的列阿德式的“喊着乌拉冲锋！”

为什么波·克里切夫斯基认为，“**计划策略**”只能以诸原则以及最一般的现实条件为根据呢？这是没有人知道的秘密。我们根本不理解由于什么原因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在制定行动计划时应当考虑的只是“专制制度的存在”，而不是俄国各种社会力量的对比，不是俄国无产阶级发展的程度，不是自身的组织性（或者无组织性），以及最后，不是它们钱柜里“富裕现金”的数量。根据我们肤浅的看法，可以得出结论说，这一切——十分“具体的”——条件，更可能被读过波·克里切夫斯基的著作因而轻视“计划”并且硬说“策略是发展的任务增长的过程”等等的那种人所忽略。我们确信而且克里切夫

斯基的例子更加巩固了我们的信念如果谁注定要不断“动摇”，那正是这号才智水平的聪明人。

波·克里切夫斯基断言，《曙光》杂志和《火星报》迷恋着**不变的**行动计划。他想引用第 4 号《火星报》社论来证实这种看法。社论说，只有系统地和坚定不移地实行的活动计划才配称为策略。然而坚定不移地**实行通常的计划**完全不意味着决心在任何时候**也不改变**计划。这一点从波·克里切夫斯基引证的社论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它的作者直率地说，策略是可以改变的，不过他不无挖苦地同时补充说，只有讲究策略的人才能改变策略，没有坚强组织因而没有**统一行动**的政党是谈不上策略的。他的这些看法也是对波·克里切夫斯基的嘲笑。因为克里切夫斯基暴露出可以“在 24 小时内”仓卒改变策略的轻率意见和企图掩饰自己对待李卜克内西的幼稚的轻率态度。上述社论的作者指出，“《工人事业》杂志之借用李卜克内西的名义自然是徒劳的。24 小时可以改变关于某个专门问题的鼓动策略……然而不仅在 24 小时内，甚至那怕在 24 个月之内，要改变自己对于整个说来是否始终和绝对需要战斗组织与在群众中进行政治鼓动的看法，只有没有任何原则的人才有可能。”这个意见击中了克里切夫斯基的要害，他看到自己可笑的失误之后，马上开始关于策略的“不宜说出口的”议论，以便想个什么办法向广大读者掩盖自己论点的难处。

《工人事业》杂志的策略家接着说：“**过程策略——这是根据原则永远探索新的道路**，这种探索像任何人类探索一样，都会有错误，**然而它是运动向前增长的唯一保障**。人们早就知道，什么事也不做的人才不犯错误。”

“我的朋友，阿尔卡季·尼古拉耶维奇，请不要说漂亮话!”永远探索新道路，而且还是在原则的光照下探索，不用说是好事情。但是只有当“探索者”找到某种真正新的东西时，它才是好事情。当他“永远”发现着早已发现、可他却由于自己极其无知而怀疑其存在的那些美洲的时候，那么他的“永远的探索”只是意味着同样“永远”没有能力弄明白较有经验的人向他所说

的话。那时这种“永远的探索”决不是什么“高尚的作风”。那时它应该得到的不是赞扬，而是严厉的谴责。

根据以上所述，读者自己已经能够对波·克里切夫斯基所介绍的几种类型的策略的优点做出应有的理解。不过为了印象完整起见，他应当再读一读下面的几行话：

> 革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只是通过自己的自觉工作来**加速**客观的发展，而不是取消这种发展，或者代之以主观的计划。《火星报》理论上知道这一切。然而马克思主义正确地赋予自觉的革命工作的巨大意义，**由于《火星报》对待策略的教条主义观点**，使得该报在实践中**低估了发展的客观因素或自发因素的意义**。我们已经指出，**计划策略**是同马克思主义基本精神相抵触的。因此不足为怪，《火星报》由于接受了计划策略，也就**不得不**违背自己的意志，接近于阴谋家对待革命“准备”的观点，也就是在革命发展的**最后行动**中把客观的或自发的过程放在次要地位上。

很好。波·克里切夫斯基“指明”（我们已经知道他**怎样**指明的），“计划策略”是同马克思主义基本精神相抵触的；所以我们只好着手分析著名的“**过程策略**”或同样著名的“**活动策略**”。而当我们发现认清这种策略的内容是不无裨益的时候，我们的哲学家就“拿起自己的章程”傲慢地对我们重复说，这种策略在于同党的增长一起增长的策略任务的增长过程。如果我们不满意这种回答，那么所有的人和每个人都会明白：我们中了教条主义策略观点的流毒。这真是妙哉论证！

该放弃“计划策略”了，何况我们本应给予“客观过程”以较之我们迄今都很重视的“主观计划”更多得多的地位。那时我们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

义者。这又是极端深刻的见解。只可惜我们的作者没有完全成功地叙述自己的思想，因此那里存在着一些模糊不清的地方。我们试用别林斯基的说法，擎着诗的火炬进入问题的黑暗处。我们以为，波·克里切夫斯基的策略哲学用科济马·普鲁特科夫[1]的诗《面向尘世》可以很好的说明：

我常常站在岩石上：——
让我投身大海吧……。
命运会送给我什么：
欢乐还是悲愁？

也许他困惑，
也许他不怨恼……
瞧，鸟禽在跳跃，
而往何处去——他却不知道。

这首诗很久以来之所以受到我们的喜爱，因为它对“自发的客观过程”作出了应有的评价，而对“计划策略”根本不予重视。像卡列耶夫和米哈伊洛夫斯基之流的主观唯心主义者认为，马克思的理论把人们的主观计划同社会关系的客观发展过程对立起来，并且为了客观过程的更大光荣而谴责这些计划。根据这一点，他们指责马克思主义者鼓吹无为主义。人们揭穿了“主观主义者”先生们对马克思的错误理解。人们曾向他们指出，从《资本论》作者的观点看来，上述对立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人们的主观计划是客观发展的表现。在这种情况下本来可以期望，“主观主义者”所臆想的对立至少在那里自封为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家的著作中不会出现。现在，这个期望原来是

[1] 这个笔名的讽刺形象寓意思想上的停滞不前、政治上的安分守己、文字上的陈陈相因。——译者注

没有根据的。波·克里切夫斯基出现了，并且在修正和补充了“主观主义者”陈旧的臆造以后又重新使这种臆造振奋了精神。如果卡列耶夫先生有幸拜读克里切夫斯基先生的大作，他会满意地发现，“主观主义者们”的错误其实是很小很小的：他们认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毫不尊重人们的主观计划；而根据波·克里切夫斯基的言论则是，马克思主义者不承认那些力图预见社会发展客观过程的方向并且据以制定自己计划的革命者是自己哲学上的同志。C'est tout comme（这完全一样），可以不无根据地大声说：“一个老讲废话的人。”

波·克里切夫斯基深信，他的策略观点是“把马克思最深刻的历史哲学原理之一运用于党派斗争”。我们打赌，读者您猜不着他指的到底是什么“原理”。听我说出来您会惊讶的。波·克里切夫斯基所谓著名原理就是人类只会给自己提出可以实现的任务：“像人类一样，——克里切夫斯基说，——在我们的时代代表前进运动的社会民主党给自己提出一个接一个的策略任务是以产生完成这种任务的‘物质条件’为前提的。”

这句话中最令人惊讶的是这样一种情况：社会民主党竟然站在人类的范围之外。的确它代表人类的前进运动；然而从它**模仿**人类，“像人类一样”行动中可以看出，它不是人类的组成部分。我们这位“人类的”策略家只是忘了告诉我们，社会民主党站在人类的哪一方面：它是**在上面**还是在下面呢？

最后要指出，波·克里切夫斯基还遗漏了一种类型的策略，即**废话策略**。这种非常重要的类型的策略照样也可以看成：（1）**计划废话**，（2）**过程废话**和（3）**技术废话**。我们可以同意，如果我们从计划废话和过程废话的观点来看类人的波·克里切夫斯基的文章，我们也许会觉得这篇文章具有全新的面貌。